

# 试论近代浙江教会中等教育

——以杭州蕙兰中学为中心的考察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浙江是近代中国教会中等教育开展最早也是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西方在浙江创办了 20 余所教会中学, 杭州蕙兰中学是其中最著名的教会中学之一。蕙兰中学在 50 多年的办学生涯中,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学经验, 即施行上乘教育的办学宗旨, 重视德育、智育、体育、课外活动有效开展的特色教育, 具有借鉴和传承价值。

**关键词:**近代浙江; 教会中等教育; 办学经验; 启示

**中图分类号:**G6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98(2015)01-0046-06

## Tentative Analysis of Missionary Secondary Education in Modern Zhejiang

——With Hangchow Wayland Academy As a Case

ZHANG Mei-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chow, Zhejiang, 310015)

**Abstract:** Zhejiang is one of the provinces where modern China's missionary secondary education was introduced in the earliest period and is the most developed. Of more than 20 missionary secondary education schools establish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Hangchow Wayland Academy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During its 50-odd years of school-running career, Hangchow Wayland Academy accumulated a series of experiences for school-running, namely, adhering to the aim of quality educ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mo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special education in after-class activities, which have a great value for reference and inheritance.

**Key words:** Modern Zhejiang; Missionary Secondary Education; School-running Experience; Implication

浙江是近代中国教会中等教育开展最早也是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在全国享有一定的地位<sup>①</sup>, 自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相继在浙江创办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会学校。迄至建国初期, 浙江共有教会中学 21 所。其中, 杭州市私立蕙兰中学 (Hangchow Wayland Academy, 简称蕙兰中学) 是最著名的教会中学之一, 教学质量高, “当时程度与美国中等学校相等, 毕业生可保送美国藤纳逊、许耳立、非佛

兰、格林格拉、麦苏各大学。”<sup>[1]2</sup> 从 1899 年创办到 1950 年被“立即接管”<sup>[2]380</sup> 的 50 余年办学历程中, 蕙兰中学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值得借鉴的办学经验。现结合相关史料, 对此作一探讨。希望通过对蕙兰中学这一个案的研究, 能深入、客观地理解和认识浙江教会中等教育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收稿日期: 2014-10-11

作者简介: 张美平 (1964-), 男, 浙江遂昌人, 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外国教育史、教会教育等。

①根据 1934 年初的统计, 全国有基督教中学 240 所, 学生 34081 人。其中, 浙江 20 所, 占全国总数的 8.33%; 学生 3249 人, 占 9.53%。学校和生数均位居全国第四。摘自王治心所著《中国基督教史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一、蕙兰中学的创办及沿革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值“泱泱神州多事之秋”,美国北浸礼会甘惠德牧师(W. S. Sweet)携夫人来杭播道,见浙江人文荟萃,而省内学校尚未普遍设立,于是在杭州石牌楼淳佑桥东购地数亩,建筑校舍,设立蕙兰学校,“冀灌输泰西文化,以补我国教育之所不及”<sup>[1]</sup>。学校初创时,主要为教会及教友子弟而设,首班学生仅4人,未几增至24人。教师仅3人,即甘惠德夫妇及一名中国人。学习年限五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学校暂停。翌年春,学校复课。1903年,甘惠德创办蕙兰女学,招收女生,是为杭城男女同学之先导。1912年,蕙兰女学与贞才女学(1867)、育才女学(1899)合并,成为杭州弘道女子中学(Hangchow Union Girls' School)。从此,蕙兰学校专招男生。1908年,教会派慕珥出任校长。慕珥主政期间,“三育并进,而惠校运动之名闻于江浙矣。”<sup>[1]2</sup>

1911年,蕙兰学校更名为蕙兰中学堂,学制由五年改为四年,是时在校学生数达到67人,教师13人。1912年,学堂再次更名为蕙兰中学校。1915年,慕珥任满返美,葛德基(Earl Cressy)自浙江金华来杭,执掌蕙兰校务。次年,葛德基回国,教务长徐钺被委以代理校长之职,是为华人担任教会学校领导之发轫。1923年,湖州浸礼会牧师葛烈腾(E. H. Clayton)任蕙兰中学校长。1922年11月,民国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将原来的中学学制由四年改为六年,分初、高中两级。1924年,为了与中国学制相对接,蕙兰中学将学制延长至六年。192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准予蕙兰中学立案。1927年,民国政府颁布《私立学校规程》,规定教会学校须接受政府的监督与指导,校长须由华人担任。是年6月,浙江省教育厅明文规定浙江省境内外人所办教育无条件予以收回<sup>[3]</sup>。葛烈腾辞去校长一职,由徐钺继任,学校更名为杭州市私立蕙兰中学。经过历任校长的苦心擘画,悉心经营,蕙兰中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迄至抗战前夕,学校已成为设施完善的完全中学,拥有春、秋季17个班,学生1300余人,教职工65人,图书4万册,校园面积

达52亩,校舍大小共16幢<sup>[1]5</sup>。

1937年,抗战军兴,杭州沦陷。蕙兰中学被迫辗转迁移,迁往上海,加入华东联合中学后,又与杭州弘道女中、之江大学附中等校联合,设分校于绍兴。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蕙兰中学不甘在敌伪统治下苟存,乃毅然停办。抗战胜利后,蕙兰中学返杭复校。1951年7月,学校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并与国立浙大附中合并,改称杭州市第二中学。

## 二、蕙兰中学的教育特色

### (一)办学宗旨:“与学者以上乘教育”

蕙兰中学“原为教会学生而设,而教外学生亦获益非浅。”<sup>[4]2</sup>学校甫一诞生,就提出了培养具有基督化人格、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的人才的办学宗旨,“本基督博爱之精诚,树储建国之大材,作育后进,造福人群。”<sup>[1]1</sup>为达此目的,蕙兰中学制定了高标准的教学及管理措施,“教授法悉与美国中学校相等。”<sup>[4]3</sup>学校的升级标准“各科以七十分为及格”<sup>[4]3</sup>。高规格的人才培养标准、极严格的教学及管理措施为蕙兰中学实施高质量的办学奠定了基础。

民国以降,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蕙兰中学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调整了办学宗旨,使之更贴近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1917年制定的《蕙兰中学校章程》规定:“在于秉基督教之精神,与学者以上乘教育,是以各科并重,精心训练,尤注意于德育,庶无舍本逐末之病。”<sup>[4]8</sup>蕙兰中学调整后的办学宗旨更加务实和具体,给学习者提供“上乘教育”,重视各科并重,强调德育教育,以培养具有基督化人格的服务国家的各方面人才。

进入20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西方在华教会机构受到强有力的冲击。蕙兰中学顺应潮流,调整了教育方针,采取了更加契合中国实际的举措,将其办学宗旨进一步调整为:“本中学以基督牺牲与服务之精神,根据三民主义完足小学之基础训练,并增进学生之知识技能,以适应民族生活之需要为宗旨。”<sup>[5]1</sup>跟以往相比,蕙兰中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有较大调整,宗教色彩有所淡化,将增进学生之知识

技能与中国社会需要相结合。同时强调人生成长需要历练,需要“牺牲与服务之精神”。这为后来蕙兰中学生报效国家、积极参加抗战和推翻国民党政权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蕙兰中学没有提及给学生提供“上乘教育”或类似表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视或做不到这一点。师资是最能反映学校办学质量的要素之一,1924年,拥有20名教员的师资队伍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有17人,占教员总数的85%。其中,教会大学毕业的有12人,占60%,留学归来的有3人,占15%。又如,该校英文部6名教师中,3人是美籍文学士,2人毕业于著名的教会大学上海沪江大学,1人毕业于著名的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公学<sup>[4]4</sup>。这样的师资构成,就是放在90年后的今天,和大城市条件好的中学相比,不见得会差到那里去,这足以说明蕙兰中学能够“与学者以上乘教育”。

## (二)德育、智育、体育、课外活动的有效开展

### 1. 德育教育:期纳学生行动于正轨

蕙兰中学重视学生道德、思想、行为规范之养成,“期纳学生行动于正轨”<sup>[1]3</sup>,以便成为“品行纯粹、学问优美之人”<sup>[4]14</sup>。蕙兰中学在德育教育方面的举措有二:一是通过建章立制,对学生的思想、行为等进行规范。根据《私立蕙兰中学学则》,除日常行为管理规范以外,学校还制定了“训育标准实施细则”,内容具体,有针对性。其中,“积极的”训育目标包括关于国防训练、体育训练、德性训练、智能训练、劳作训练、政治训练、社会服务训练、美感陶冶等八项内容。上述训育目标中,“细则”又对每一项目标做了具体的规定,例如,“关于智能训练”的目标是“养成好学精究的态度、审慎周密的参考”,接着规定了八项要求:求学要精益求精;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耳到、心到;书中有疑问须求明了为止;读书要实事求是;按时上课、定时自修;考试绝对不能舞弊;研究学问须有考据和发明志向;读书要细心又要有恒心<sup>[5]10-12</sup>。

二是重视宗教教育。宗教是教会教育之基石,是“任何教会教育机关的首要责任”<sup>[7]1036</sup>,蕙兰中学也不例外,它将宗教教育列在“三育”的首位:“本校授诸生以圣道,即德育也。人先有德育,而后可进于智育、体育,且得收二者之效。”<sup>[4]2</sup>因

此,蕙兰中学在长达五十余年的办学实践中,用基督化的人生观、习惯、态度、理想与知识教育学生。在开设宗教课的同时,还强调须遵守“崇道”规则:“诸生每日午刻及星期,应齐集礼拜堂研究圣经,不得告假,以期共明天道,正心术而励身修,至进教与否,悉任自由,毫不勉强。”<sup>[8]73</sup>由此可知,蕙兰的“崇道”至少体现如下内涵:一是宗教教育始终是教会办学的宗旨,作为宗教教育的主阵地,教会学校必须以一贯之地加以坚持;二是宗教教育不仅要灌输宗教知识,而且还要承担如何做人的德育教化职能;三是体现了尊重学生选择权的人性化教育模式,不强求每个学生必须信教,“进教与否,悉任自由”。这一点还可以从1947年的“蕙兰中学布道会活动计划”中看出:星期二,早礼拜(参加人数约百分之四十);星期三,祈祷会(自由参加);星期四,英文礼拜(全体高中学生);星期五,查经班(高年级基督徒学生);星期六,早礼拜及青年团契;星期日,主日崇拜(自由参加)、主日学<sup>[9]7</sup>。

蕙兰中学在开展课堂教学和宗教仪式以外,还组织种类繁多的旨在提升学生道德水平及能力的课外宗教活动,如青年会查经班、祈祷会、基督徒友谊会、退思会等。其中参加人数最多、活动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要算青年会。青年会成立于1906年,以信基督的青年为基本会员,邀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教职员为赞助会员。活动内容多种多样,如灵性修养集会、德育演讲、格言露布、读书会、庆祝圣诞大会、会员同乐会、旅行体育活动以及筹办平民学校、邻童主日学校、开展卫生宣传等<sup>[10]190</sup>。可见,活动几乎涵盖一切学生生活,甚至可辅助某一方面学校的行政工作。课外宗教活动是蕙兰学生自我提高和成长的良好平台。

教师以身作则,营造了德育教育的良好氛围。葛烈腾“平时人很爱学生,尤其爱中国的学生,学生有什么困难和他商量或被他知道,他都乐于帮助”<sup>[1]9</sup>,被称为“尽瘁教育,热心救济,真是中国之友。”<sup>[1]7</sup>对于普通教师,蕙兰学子也是赞誉有加。张振华回忆,英文教师方同源“严而又严,每次上课的时候,竟不放松一分一秒的问而又问,读而复读,做而又做,不断地重复着读、听、写、说、做,当

时,真使我们感觉到这门功课太繁重了;但是方先生这样的认真负责教学,直到现在,才觉得他教学认真的益处……我不知不觉地会感慨到蕙兰是我受教育的母校,亦是教我学做人的家庭。”<sup>[1]3-5</sup>正是这样一群负责敬业、深爱学生的教师群体,营造了爱意绵绵的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气氛,“全校学生皆来自各教会,融融泄泄,情同兄弟,学校尤似家庭。”<sup>[1]</sup>

## 2. 智育教育:国文英文并重,培养中西贯通的人才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强化对教会学校的管控,对其课程进行了规范,使得官办学校和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几乎没有差别。即便有差别,只是体现在显示双方各自侧重的一些科目的程度上。蕙兰中学为了与公立及其他私立中学竞争,在中国立足,必须对课程设置作相应的调整。在重视学科均衡发展的同时,它还提出了如下措施:

首先,继续保持英文的优势地位。教会学校是依靠英文和西学在中国扎下根基,吸引广大学生的。立案前,蕙兰中学的英文课时数很多,“每周至少8~9小时,甚至有加至12~13小时,”<sup>[10]191</sup>英文课本悉用原版。1918年,蕙兰中学英文的平均周学时数为9小时,占总学时数的30%,超过了同期的公立中学(平均周学时数为7.75小时,占22.6%)<sup>①</sup>,足见其对英文的倚重。在课程内容的设置方面,蕙兰中学突出会话、阅读、作文等社会急需的实用能力的培养。立案后,蕙兰中学被迫大力削减课时。根据1926年《本校历年章程汇订》,学校的英文周学时数由原来的9小时减至6小时<sup>[11]17</sup>,与教育部的外语课时数为6小时的规定持平。课时数下降,势必影响其英文教学的优势地位。蕙兰中学的弥补措施是普遍开设选修课。例如,除必修的“英语”外,还开设“英文文学”“翻译”和“近代英文选”等选修课程。再者,通过第二课堂,如组织英文会、编辑英文刊物、阅读英文圣经等各类活动。学校还规定,“每周四

全体高中学生必须参加英文礼拜。”<sup>[9]7</sup>这些举措使蕙兰中学的英语教学由课内向课外延伸,确保了英语学习的连贯性,学生依旧能保持足量语言的输入与输出,使得其教育质量在浙江的各类中学中依然保持领先地位。

在教学方法方面,蕙兰中学结合语言教学的特点,突出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1911年,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应邀来校考察。王卓然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学生自动的团体,有中文演说会二,英文演说会一……。教室内参观,中学一年级甲组英文,教师令学生各述其所学者,学生答者很流畅。孟禄很赞美教师教法之好。又到四年级参观讲授英文通史,教师为一美国女士,完全用英文教授,学生直接听讲,教师就书中发问,令学生回答;又令学生发问,教师回答,或别的学生代答,其教法很活泼有趣。”<sup>[12]346</sup>正是“所有学科均切实用,英文程度尤为高深”,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入以英文见长的教会大学上海沪江大学或美国大学,毋须考试<sup>[13]</sup>。

其次,重视国文教学。一般认为,教会学校重视英文,对国文有所忽视<sup>②</sup>。但蕙兰中学的做法与众不同,尤其偏重国文。甘惠德曾经说过,“新生选取,全凭国文,必须以国文程度为依据”。<sup>[10]190</sup>根据1926年《初级中学学程表》,国文的周学时数为7小时,英文为6小时。除要求阅读《国语教科书》外,还要求“以抒情文、学术文、应用文、修辞学及国音学、文学通论、国语文法等补充之”。高中国文和英文一样,均为6小时。《高级中学学程表》的“附注”规定:除上列二项(即学程表中的“国文评注”“选读”)外,须加授《中国文学史》一年(高一)、《中国文学概论》一年(高二)、《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一年、《文字学》一学期<sup>[11]17-22</sup>。可见,蕙兰中学对国文的要求非常高,其加授的课程是当下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在课程设置及其要求上确保了国文和英文平起平坐甚或超越英文的地位。而且,蕙兰中学还通过制度的杠杆来保证重视国文的措施落到实处。“当时对英文颇为注重,

①根据“壬子·癸丑学制”,中学“外国语”四年的周课时分别为7、8、8、8,平均数为7.75小时。(参见《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一期,第55-56页。)

②过度强调英文,中文教学流于形式是不少教会学校的教学短板。如林语堂就读的圣约翰中学规定英文不及格不能毕业,而中文不及格可以领到毕业文凭。

……仍以国文为上,试观入学考试时,各科比例为国文二分,算学一分,地理一分,英文一分,至于平日更有明文规定‘其有侧重英文抛荒各科者,当停读英文,补习各科,俾免偏颇之弊’”<sup>[1]1-2</sup>。作为教会学校,蕙兰中学将国文突出于各科之上的做法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蕙兰中学较其他教会学校对中国社会有着更为成熟的了解,在当下的中国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 3. 体育教育:“促进运动之技艺,焕发学生之精神”

“在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儒学教育中没有体育的地位。”<sup>[14]114</sup>教会中学之所以能成为开风气的新鲜事物,是因为采取了许多有别于中国传统学堂的“另类”做法。重视体育,是蕙兰中学一以贯之的传统。《蕙兰中学校章程》规定:“本校注重体育以促进运动之技艺,焕发学生之精神,健壮学子之身体为宗旨”<sup>[4]15</sup>。“本校课程使德体智三育各得其效。”<sup>[4]3</sup>可见,蕙兰中学的“另类”在于,它充分认识到体育锻炼能为将来全面有效的生活提供身体的保障,因而它敢于打破传统的思维惯性。蕙兰中学创办伊始,就开出体育课,而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壬子·癸丑学制”还没有体育课的设置。直至1923年,新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才开始设有体育课。其次,设立专门职位,抓好体育工作。学校专设“运动主任”一职,由美国文学士尤英君任主任。学生层面的机构是“运动会”,有副正、会长、书记、司库等若干办事员。再次,狠抓课外锻炼。学校规定,每天下午四时后为课外活动时间,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运动,违者要罚。“当时规定:下午课后,学生一律至运动场活动;运动完毕,一律至淋浴间淋浴,隆冬腊月,概不例外。遇有学生畏寒‘逃浴’,慕珥则一一点名抓至浴室,淋以莲蓬,不稍姑息。开始或感‘外国校长’举止‘野蛮’,久而久之,亦得其益,因之学生体魄,健硕逾恒。如今老年校友缅怀往事,对此印象独深,无不津津乐道。”<sup>[8]73</sup>正是对体育的重视,学校人才辈出,“球类、田径,尤负盛名。诸如国内大专院校知名教练宋君复、舒鸿、吾舜文、陈建亲等均出其门,此乃该校一贯重视并努力提倡故也。”<sup>[8]73</sup>宋君复曾作为教练兼翻译率运动员刘长春等三人代表中国首次参加了1932

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抗战前,蕙兰中学曾连获杭城中等以上学校篮球锦标赛两次以上以及网球“果然第一”的锦旗;1948年在浙江省运动会上获田径总分第4名,排球、足球双获市私立中学对抗赛冠军;1949年获足球第一届钱武肃王杯中学组冠军<sup>[10]191</sup>。这些可圈可点的成就,是与学校的重视分不开的。

### 4. 课外活动:注重社团建设,增强学生综合素质

社团活动,和体育运动一样,是课外活动极重要的一环,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延展、连接和深化。蕙兰中学制定了《课外活动规程》,对社团的审批、组织、活动、考核等作了明确规定,实行“课外活动绩点”制,绩点与操行、毕业挂钩,初中绩点在70以上、高中在75以上方为合格。蕙兰中学还组织了特色鲜明、充满个性的各类学术、文娱、体育团体。学术方面如“国家研究社”“法学研究社”“晨曦诗词研究社”“文哲研究社”“无线电研究社”“癸酉级英算研究社”等。艺术方面如“畅乐社”“国乐社”“叶蔓剧社”“西画研究社”等。还设有青年会、布道团、英文会、中文演说会、英文演说会等。学校也有很多出版物,如《蕙兰》《蕙兰年刊》《蕙兰校刊》《蕙兰季刊》《雪耻会旬刊》等累计约30种。其中有些是校刊,有的是学生编印的小型杂志刊物,或刊散文、小说、诗歌,或谈论国事,或讨论宗教,等等。校刊大都是中英文合刊。

## 三、蕙兰中学的办学成效及其启示

蕙兰中学整整52年的办学历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本校创办以来,对于来学后生,无不著意栽培,故毕业及修业诸生,担任教师教员,执业铁路、银行及肄业于本国、美国大学者为数颇众,均系有用之才。”<sup>[4]7</sup>蕙兰中学前后共有50届毕业生,计有初高中毕业生约2700人,许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系各界翘楚。例如,作家郁达夫、陆蠡;教育家胡家健、陈鹤琴;翻译家、散文家冯亦代;画家董希文;体育教育家宋君复;园林建筑学家陈从周;水利专家钱宁;环保专家金鉴明;材料物理学家周本濂以及著名化

学家苏元复等约二十名院士。而且,旅居海外的港澳同胞以及华裔美籍的知名学者和实业家,很多是蕙兰校友。蕙兰学子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促进中西交流中做出了贡献。

通过对蕙兰中学的考察,如下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如何做好德育工作。教会中学普遍重视面向“全人教育与文化陶养”的宗教教育。其实,宗教教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灌输,而是融入了如何做人的德育教化工作。蕙兰中学青年会活动几乎涵盖一切学生生活的健康组织,其开展的读书会、旅行体育活动、筹办平民学校、开展卫生宣传等事工非常值得借鉴。这些服务事工,不仅是德育教育,本质上也是课程,属于隐性课程。又如,用英文做礼拜、阅读英文福音课本,对于当下的德育教育也是很好的启示。教师可以从《北京周报》等向英语世界宣传中国的英文报刊杂志上选取部分浅显的文章,指导学生阅读。这样做,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又促进了英语学习,掌握了许多有关中国事物的英文表达。

第二,如何对待母语。母语是我们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媒介。从蕙兰走出的郁达夫、陆蠡、冯亦代、陈鹤琴、胡家健等各界名人,母语基础扎实。他们虽然后来在国内外的大学进修过,但他们厚实的国文基础是在中学奠定的。反观当下的母语教学,现状着实令人担忧。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广受质疑。语文教学大都着眼于了一本教材及若干教辅,围着应试教育打转,学生缺乏文本阅读训练,尤其缺乏经典阅读的训练。教育界虽然进行了各种努力,但“语文还是重病缠身。”<sup>①</sup>

第三,如何学好英语。现在的英语学习条件和外部氛围与民国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英语

教学效果不佳,广受诟病,其最根本原因是我们对阅读的重视不够。许多蕙兰中学学生经过了大量的文学阅读训练,在毕业时就解决了阅读问题,所以他们可以直接上美国的大学。

参考文献:

- [1]蕙兰中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Z]. 杭州市档案馆藏,1949.
- [2]周东华. 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视角[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3]浙限期收回教育权[N]. 申报,1927-6-12.
- [4]蕙兰中学校章程[Z]. 杭州蕙兰印书馆印,1912,1917,1918,1924.
- [5]杭州市私立蕙兰中学学则[Z]. 杭州市档案馆藏,1937.
- [6]陈鹤琴. 陈鹤琴全集第六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 [7]中华续行委办会.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8]丁荣观. 杭州蕙兰中学概况[C]//杭州市政协. 杭州文史资料第三辑(内部发行),1964.
- [9]李立楣. 杭州蕙兰中学[J]. 普福钟(复刊第三卷第九期),浙沪浸礼议会刊行.
- [10]王乔丽. 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11]杭州私立蕙兰中学校. 本校历年章程汇订[Z]. 杭州市档案馆藏,1926.
- [12]朱有瓛、高时良.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Z].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13]蕙兰中学通告[Z]. 蕙兰月刊第二期,1922.
- [14]胡卫清. 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吕娟]

<sup>①</sup>参阅相关文章:《语文课的出路:回归传统》(马智强,《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5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课》(王佳颖、靳晓燕,《光明日报》,2013年1月16日),《大学不学语文,苦了谁》(戎国强,《钱江晚报》,2010年1月25日),《汉字“失写症”,需要治了》(胡乐乐,《光明日报》,2013年8月9日)